

花果飄零

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

周愛靈 著

羅美嫻 譯

商務印書館

花果飄零

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

周愛靈 著

羅美嫻 譯

商務印書館

| 序幕

1949年10月一個晚上，在九龍一所中學三樓一個小會議室中，一圈排好的椅子坐了大概三十個學生，這羣學生互不相識，只靜靜守候；其中數張椅子空着，是留給老師的。

這羣學生靜默地坐着，但他們心緒不寧。他們大都剛從中國內地來到香港，有些倉卒逃出，有些則還有時間計畫路程和目的地；這個把他們聚在一起的動盪世代，正攪動着他們每個人的心——共產主義在中國得勝，英國的殖民地香港，成了奇怪的庇護之地——雖與祖國相連，卻又如隔千里。

他們都在憂慮：在動盪和不明朗的環境中，能不能繼續學業呢？前景如何呢？這個晚上，這羣學生因為幾個學者的名聲和理念，聚集在這個細小的房間裏，他們都信任這幾個快要來到的老師，願意把自己可見的知識前途，交託給他們。¹

這細小而昏暗的平凡教室來了這羣老師，是令人敬畏的一幕。這羣學者包括時年54歲的著名歷史學家錢穆(1895–1990)，他1930年代任教於北京大學，直至到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才隨政局南遷，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在1937到1938年，他把自己

的歷史課講稿編成令人注目也備受爭議的重要課本《國史大綱》。²

除了錢穆，進來的還有政治學者崔書琴、資深中國文學家劉尚義和曾在德國接受教育的經濟學家張丕介；這羣學者中，本來還包括當天未能出席的哲學家唐君毅。他時年 40 歲，曾在中央大學讀書，戰後回去任教並擔任哲學系系主任。³ 這羣學者彼此認識，又或是曾經共事，尤其是錢穆與唐君毅，曾經在不少地方共事——他倆在 1940 年代都曾任教於中央大學，在當時中部和沿海地區的不少期刊發表文章，並且都在 1949 年遷到廣州，受聘於華僑大學。

當時錢穆有感共產主義的勢力正在中國蔓延，儘管還沒有詳細的計畫，他決定接受朋友邀請，在香港辦學；他研究過情況以後，便邀請唐君毅一起在當時相對安全的殖民地香港開辦一所學院，這所學院便是新亞書院。⁴ 成立這所學院的目的，是要在當時中國內地一片反中國文化的氣氛之下，在香港作中華文化的代表，並保護、恢復、傳揚和延續中國文化。書院的創辦者雖然來自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信念，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不喜歡反傳統文化，他們認為反傳統文化的力量中，共產主義是最危險的。他們認為共產主義背叛了中國文化的基本，也因此他們寧可自我放逐，流亡香港。他們視儒家的思想和價值觀為建構中國文化的核心和內涵，覺得當時內地既然否定和揚棄中國文化，自己有責任在香港這個邊緣地區，讓傳統文化得以保護和承傳下去，直至祖國不再否定自身的文化的時候，獲保存的文化之

火，便能回歸到其根源；故此，為了要保存中國儒家的思想和價值觀，新亞書院不單教導儒家思想，其教育方式本身也融入了儒家的理念，好讓當時身在中國周邊的年輕人能夠得到栽培，令他們將來可以回到祖國的核心，重建和復興中國文化。

本書追溯新亞書院從 1949 年成立到 1963 年的歷史（書院在 1963 年與其他院校合併，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的成員書院）。這段時期，凸顯了一羣學者如何努力地建立一所反映中國文化和儒家教育哲學思想的學校，他們試圖通過在新亞書院辦學，努力維持他們認為切合儒家教育觀的學校體制、課程內容和師生關係；儘管他們的教育對象主要是適齡的大學生，但他們也把教育工作延伸到兒童、高級研究生，甚至更及於香港的知識階層。他們希望通過教育不同層面的中國人，來保留和延續他們珍視的中華文化，並且透過培養學生，令他們往後能夠堅立和傳播中華文化的精髓。

不過，要建立一所有儒家內涵、儒家模式和儒家作風的文化教育學院，並非這麼簡單和直接；這樣的學院本身便充滿了局限和矛盾。因為雖然新亞書院的設計，跟其創辦人本身，都以儒家的方向和方式來定位；但這羣創辦人也同時希望可以擴大新亞書院在社會上的形象，令其信息能夠傳達到社會上更多的層面。故此，在實踐上，比如在課程設計等，可以見到他們其實是採

納了比較抽象和籠統化的中國文化的論述，並且也在當中加入了西方的元素和新的東西。他們這種做法，雖然能讓書院的內容更為多元化，令書院的定位較不受規限而變得有彈性，以讓書院在香港社會中有更大的影響力；不過他們這樣做，實際上是把中國文化的論述擴充和加添，這最後也令他們意欲保留的中國文化，無論在所包含的範疇上和內涵的定義上，都越來越含糊不清。再者，他們的最終理想是要把強化後的“中國文化”，將來重新帶回祖國，但同時，他們又嘗試調節其教育配套，以適應香港的新情況。這意味他們的教育課程，會在意義和方向上面對日益加深的矛盾，在定位上也會越來越難清晰。

香港 1949 年的狀況，對當時新亞書院的發展尤為重要，因為其時在香港參與和支持新亞書院這計畫的各方，都對這所文化教育學院，有自己的看法和期望。

在新亞書院開始發展的十多年間，數個美國非政府組織受到新亞書院“保護中國文化”的堅持所吸引，對新亞書院提供了重大的支持，如果沒有他們支持，新亞書院可能難以生存。在這些非政府組織中，有些支持新亞書院是因為在當時中國政權改變以後，想找新的支持對象；有些則希望找到支持亞洲文化生活的渠道。但總的來說，這些非政府組織都認為，新亞書院的課程可以保護華人青年的思維，抗衡在他們眼中，共產主義對中國青年的思想荼毒。儘管抗衡和防止中國共產主義傳播是他們最關注的事情，他們卻想把這工作跟美國政府的政策和政治行動分開。他

們發現香港作為他們在亞洲實踐長遠目標的根據地，是一個既安全而又中立的地方，既適合作為反共產主義的中立根據點，也同時可以讓他們在不太受嫌疑之下工作。在這個情況底下，當時新亞書院通過教育來保存中華文化的理念便尤為重要，因為對這些非政府組織來說，支持新亞書院可以讓他們在中國共產勢力之外教育中國青年人，也同時可以強化中華文化；而他們跟新亞書院一樣，相信中國文化是跟共產主義對立和抗衡的。

此外，新亞書院設在香港，意味它不免受到香港的英國殖民地政府的影響，故它也日益渴望得到殖民地政府的支持。剛開始的時候，殖民地政府面對像新亞書院這種為難民提供專上教育的學院，無論在價值和定位上也不確切，故此既不協助也不干預。直到新亞開始扎根，而香港學生對教育機會的需求越見增加，英國人開始認為參與新亞書院的發展，有助在全亞洲傳播他們的學術思想和加深其文化影響；再者，支持新亞書院可以幫助香港在教育上定位，令香港在當時敵對的兩個中國政府之間——也就是中共政府所管治的中國大陸，和民國政府所管治的台灣之間，成為一個中立之地；這樣能阻止殖民地香港的教育跟大陸和台灣有任何聯繫。同時，發展香港的專上教育，也可以在當時戰後全世界面對擺脫殖民和冷戰的緊張時期，幫助政府塑造和監控殖民社會對中國文化的身份認同，能預防任何威脅殖民地穩定的文化趨勢；故此，通過選擇新亞書院作為新的中文大學的成員，中國文化教育成了香港的英國統治者在亞洲的後期帝國管

治政策中不可切斷的一部分。

如前所述，殖民地政府和美國非政府組織對新亞書院的象徵性與策略性意義，各有自己的理解。整體而言，他們這些期待，雖然有助書院的成長，但也窒阻了其發展。在當時來說，獲得政府和這些組織在建制上和經濟上的支持，對書院的存活和發展十分重要，故此政府和這些組織對書院的期望，便很大地影響了書院在細節與概念上如何去實踐其方向與目標。書院的創辦人有本身的理想和用意，而政府和其他組織也有其理解和期望，互動影響之下，本身旨在成為一個活的文化象徵的新亞書院，卻成了一個戰場——在那裏，文化身份認同的象徵意義變得越發複雜和模糊。

由於新亞書院並沒有把自己跟外在的勢力分開，因此被迫不斷地重新協調和界定他們理想中的文化教育，令書院變成一個文化意義的爭奪之地。各方的野心和理想在此雖得到建立和提升，但也同時被壓抑阻攔，這個矛盾的結果令新亞書院作為歷史研究的對象，無論在象徵上和實際的層面上也非常重要，但卻也令理解教育、政治和文化這三方面變得更為複雜，而其中的互動關係也更為千絲萬縷。

新亞書院的早期發展，在歷史研究上有數個地方尤為重要：就香港的歷史發展而言，研究新亞書院早期的發展有助了解

香港戰後的知識、文化和教育歷史。到目前為止，香港教育歷史的研究（包括大專院校的歷史）多是由個別學院贊助，作紀念和宣傳用途的。⁵而在這方面更廣泛的研究（包括專上院校之間的互動，和其與周遭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環境的關係），則多集中於香港殖民地早期又或是較為近期的發展。⁶至於有關二十世紀中期的研究，也就是新亞書院成立以後，到其成為中文大學成員的時期，涵蓋最多的文獻也並沒有詳細探討到專上教育。⁷不少學者研究這段時期，都把重點放在文學、媒體和政治運動與人物方面的歷史，卻很少涉及其他類別的思想家、作家和教育家；正因為如此，有關在香港發展的這段重要時期所出現的文化身份認同，及其形成與轉化的研究，目前可謂寥寥可數。過去的研究，只多探討本土行動相對於英國殖民地政府的戰後恢復，並就此研究經濟的關係和政治的結構。⁸

故此，本書研究新亞書院的歷史，探討知識分子如何積極地與殖民地官員談判公共政策，重新塑造香港的文化與教育，並從中對在轉變中的政府與社會關係（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方面，有更多元的理解。再者，研究新亞書院早期的歷史，能檢視教育與殖民地環境的關係，⁹成為我們窺探文化和知識狀況的另一面鏡子。本書的研究將展示一所高等院校，如何通過與殖民地政府在政策上的談判，而跟其他學院合併成為一所大學的過程；而研究這個過程，也令我們對香港戰後的高等教育發展，和在發展中涉及的各方多重利益及影響，有更深入的了解。此外，新亞

書院的發展過程，發生在英國殖民地香港，也意味其對大英帝國歷史後期的研究（尤其是教育方面）非常重要。目前有關英國殖民地教育政策的研究中，對非洲¹⁰和南亞洲有頗為詳盡的闡述，可是從殖民地教育去研究東亞歷史的還不多，¹¹而新亞書院的故事有殖民地的背景，因此，通過研究新亞書院的歷史，去檢視大英帝國在亞洲，特別是在戰後的發展，與擺脫殖民地思想正盛的時期，通過香港的高等教育政策去重新界定其文化價值和歷史承傳，我們便能填補這方面研究的貧乏。

冷戰時期，敵對的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的紛爭，使戰後的政治環境甚為複雜，也令香港的角色特別模糊和令人困惑；而新亞書院的歷史見證了 1950 年代亞洲內不同的外來政治和文化意圖的拉鋸和相持，而這些拉鋸狀態也揭示了當時代表不同利益的各方——包括英國殖民地政府、美國非政府組織，以及新亞書院本身，都希望能創造和維持一個中立之地，以獨立於阻礙自己目標的黨派聯盟，而在這方面，非政府組織的工作尤為重要，他們對新亞書院的支持，揭示了美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當時對亞洲冷戰政策的不同處理手法。不少亞洲歷史的研究，都把注意力放在西方的信仰、人權和非政府的政治組織上，對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工作說得很少。而數份着力描述香港非政府組織的文獻，都只是集中討論宗教團體。¹²新亞的故事，令我們可看到美國非政府組織對香港文化身份認同和教育發展的影響，也同時道出了在一個戰後的英國殖民地，因冷戰而帶出的複雜形勢。

新亞書院的歷史，作為當時整個冷戰狀況的其中一部分，也能映照到共產黨在 1949 年執政後中國的複雜本質。作為對香港反共移民的個案研究，這段歷史揭示了這些移民如何影響中國周邊地域的中國文化身份認同和活動，雖然學者對當代華僑和華人離散社羣的研究逐漸增加，但仍然很少研究會專注於中國移民對直接相連的周邊地域（比如香港）在文化上的影響；而儘管有些學者曾經概括地提出中國文化有從中國核心往周邊地域遷移的說法，¹³ 但實際上這怎樣發生、詳細情況如何、其中的人物又是怎樣去理解他們自己轉變中的文化責任和文化身份的認同——這一切，還是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查考。

同樣地，另一個值得關注卻又少有研究的問題，就是這些由反共意識所推動的人口遷移，如何在隨後的日子，在中國周邊的華僑中，塑造出中國人的身份認同。¹⁴ 而新亞書院的課程，正凸顯了活在大中華地區，而又對政治敏感的知識分子，對華人文化身份認同的改變，和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看法的變化；也正是這個層面，令新亞書院的故事成為現代中國思想史的一部分，並在這方面的學術文獻中被提及得最多。熟識二十世紀中國思想的人都知道，錢穆和唐君毅都跟新儒家哲學運動有關，¹⁵ 這運動的目的是要在現代的文化和知識破傳統主義的思潮中，更新宋明理學。而學者討論此運動時，多把其分為三代：第一代的代表人物包括梁漱溟（1893–1988）和熊十力（1885–1968）；他們在完全否定中國文化的知識環境中，試圖為儒家在思想和價值觀上的優

點辯護。熊十力的三個學生——唐君毅、牟宗三（1909–1995）和徐復觀（1903–1982），則被統稱為新儒家的第二代，他們肩負復興中國文化的使命，卻在 1949 年後，遷到中國的周邊地域香港和台灣。受第二代新儒家影響而又最為人知的，有杜維明（1940– ）和劉述先（1934– ），他們代表了新儒家的第三代，也是近代新儒家的接班人，他們不但在中國人中推廣儒家價值，也把這些價值推廣到全世界。

在討論新儒家的文獻中，新亞書院的創立被看成新儒家哲學運動中其中一個主要環節，而在後來，新亞更成為這個哲學運動的主要集聚點。¹⁶ 不僅錢穆和唐君毅建立了新亞，牟宗三和徐復觀也在 1960 和 1970 年代在新亞任教；新儒家的思想家會聚於新亞，加上書院本身的學術方向，讓新亞書院成為新一把儒家運動組織性的代表聲音。而當新儒家的思想體系與書院配合起來時，也確實燃亮了新亞書院和其創辦人的中心方向。新亞書院努力推廣文化教育，跟其要在一個不大了解和接納其課程的環境中，着力保存和推廣儒家文化，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從這點而言，可以說新亞書院的確能被視為新儒家文化運動的一部分，在不斷拒絕儒家思想的現代中國裏，努力地去更新儒家的價值與體制。

可是，把新亞書院看為新儒家運動的一個環節去研究，雖令新亞在有關的研究討論中常常被學者提及，但這些學者對新亞的描述與研究，卻只流於表面。由於被界定為新儒家人物的大多是哲學家，而研究他們的，也多是哲學研究者，故他們對這個

题目的討論，也只着重分析人物的哲學思想，雖然有不少這方面的學術文獻提到新儒家的不同活動，包括了對新亞書院的描述，但這些描述，跟在新儒家的哲學思想上的重點分析相比，顯得很粗略。¹⁷ 而如對新儒家的研究只集中在哲學思想，卻不重視與其人物有關的活動，是有問題的，因為這樣不單忽略了新儒家學者的個人和社羣生活這個重要的層面，更重要的是，也忽略了他們思想裏最關注的核心——把儒家的傳統概念和價值觀跟當今的世代聯繫起來，賦予其在現代世界的意義；而在新儒家運動中的哲學家所寫的著作，並非僅希望在形而上學之處更新和改進宋明理學，而是要把宋明理學轉化成可持續地聯繫到文化理論和實踐的體系。

故此，新亞書院讓我們看到的，是在它的創辦人的心目中，文化其實是一個動態的實體，要保持一個文化的真實和活力，不單需要堅守信念，也要有實際的實踐行動；要保護和推動一個文化，包括了研究這個文化、討論這個文化和以文字去描述這個文化，不單是要有不同模式的沉思推敲，也要有多種形式的行為實踐。可是，再進一步來說，研究、討論和寫作等行動，雖然是在推動和承傳文化上不可或缺，且極為重要的，但卻仍然是不足夠和不完全的。新亞創辦人的信念基石，正是在於中華文化價值本身的人文體現：他們相信真正活的文化，是需要人身體力行的。故此，他們創辦和發展一所學院，不單本身是要去建立儒家的理念，更要把這些理念傳給學生，裝備他們，令他們能夠對

真正的中國文化與價值觀身體力行——所以新亞書院的創辦和發展，本身就是一項具意義的中國文化實踐。而不少學者對新儒家的研究大大偏重於其哲學層面，卻把文化部分放在次要的地位，這是忽略了新儒家本身對文化的重視，也漠視了新儒家一個關鍵的信念：體現文化必須有行動實踐。

所以，把新亞書院的故事，作為研究新儒家的一部分去描述，是有所缺漏，也對其歷史意義有所誤導的。用新儒家的角度去理解新亞書院的歷史，會把當時的創辦人的所思所想看得過於簡化和黑白分明——甚至他們自己也不會認同是如此簡單。¹⁸從本書的討論，讀者會見到在新亞書院創立初期，參與其運作的人，對本身想保存的中國文化並沒有很清晰的界定，他們對於要保存的文化的定義與範疇頗為模稜兩可，沒有既定的想法。雖然每一個新亞的創辦人，對新儒家哲學的信念、共鳴程度不完全一樣，但這羣創辦人都選擇在新亞書院的發展中，既包涵儒家的概念，但也同時包括並非儒家，甚至不是來自中國思想的文化和教育的觀念。實際上，要從新亞書院去辨別這羣創辦人的學術立場非常困難，而這一點，也正顯示了他們對中國文化的定義很含糊和矛盾，對儒家在傳統中國文化中的角色並不清晰。

用新儒家運動去分析新亞書院的歷史的另一個誤導之處，便是由於現存具有影響力的新儒家研究著作，作者都跟新儒家運動有關，又或是由同情或支持新儒家運動的學者所寫的，故此他們對新儒家的趨向和拓展，都偏向樂觀；在他們的描述中，新儒

家的發展，在三代以來，都是在地域上勝利地不住擴張的——就是認為儒家思想從中國大陸本身先擴展到大中華地區，而直到現在，已經是無地理限制地拓展至杜維明所說的“文化中國”了。這些描述，也意味着新儒家運動一直不斷穩定地發展，並且也光榮地和廣泛地拓展到全世界，代表着儒家的勝利。¹⁹可是，書院的創辦人建立新亞書院的意圖，卻並非如此，他們所想保留的，反而是一個特別版本的中國文化——當時中國剛被共產化，而香港是一個殖民地政府管治、商業主導的地方；而他們所想保留的中國文化，是在這個如此特定景況當中一種特定的中國文化的更新與彰顯。故此，他們的目的，跟上述的新儒家的論述很不一樣，因為他們並非想要稱霸全球的“文化中國”，而是只想中國得到文化的更新和復興。本書會談到，新亞書院的創辦人心繫神州，一心展望祖國的文化復興，其實並無往外推廣中國文化之願。新儒家運動偏向以擴張中國的文化為豪，而把新亞書院這段歷史看成為新儒家運動的一部分，便會忽略和掩蓋了新亞書院本身文化教育觀的特殊性。

本書把新亞書院的歷史從新儒家運動的歷史討論中分開，獨立研究，並且細看其創辦人的文化活動，分析他們所設計的文化教育課程的目標、科目內容和組織計畫，而不會討論這些創辦人的學術著作。此外，本書的討論也會把重點放在外力影響和環境的因素上，特別是美國非政府組織和英國殖民地政府的影響——兩者都曾跟新亞書院有很多互動聯繫，也曾對其生存與發

展有極大的影響。通過細看這羣新亞書院參與者的相互接觸，並從中了解他們對新亞的理解與期望，本書的討論便不但涉及戰後香港的政治、歷史、文化的多重層面，也在更廣大的層面上帶出了轉變下的國際政治景況和局勢，如何使新亞書院成為一個獨特的文化實驗。

本書各章節的安排，刻意凸顯當時參與新亞書院的各方，和其對新亞書院的不同看法和期待，並突出這些看法與期待交替融合後的結果，和它們對新亞書院的影響：

在第一章，我們從新亞書院創辦人的角度，通過分析新亞書院的存檔文件和所出版的各樣文章與刊物，包括他們的宗旨、校規、課程導引、做決策時所基於的原因和理念，以及學校的期刊，去細看新亞書院的文化教育大綱。我們會從這些分析中，看到新亞書院在其聲明的宗旨上、課程的設計上和組織組構上，如何以推廣中國文化知識和教育經驗為目標，但卻也同時看到，在新亞書院這一切設計和組構中，也包含了跟中國傳統非常不同，甚至是徹底相異的內容和結構。

本書第二章會談到支持新亞書院的美國非政府組織，分析他們支持新亞的背後動機。這些非政府組織包括雅禮協會 (Yale-China Association)、哈佛燕京學社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亞洲協會 (Asia Foundation) 和福特基金會 (Ford Foundation)。²⁰ 從

研究這些組織的新聞發佈、演講內容、宣傳刊物、捐款呼籲、年度報告、董事會會議記錄、財務報告、政策辯論記錄、內部備忘錄、以及私人信件，可看到這些組織選擇新亞書院作為其援助的對象的同時，對共產主義、香港和中國文化三者，有複雜交替的信念與理解；也可看到這些組織在冷戰時期，怎樣共同地去理解對香港高等教育做出支持的意義。

在第三章，我們會討論英國殖民地政府如何在整個 1950 年代，開始對支持新亞書院，甚至支持專上教育產生興趣。我們會分析政府存檔文件、教育調查、備忘錄、報紙和私人信件，並看到隨着殖民地政府把自己的各樣想法和期待放到華人教育與中國文化上，新亞書院的中國文化教育計畫儘管仍有所發展，但也在這一切理解華人教育目的和意義的競賽中、在香港殖民地的背景之下，變得更為複雜。

本書第四章，會總結第一至三章所討論過，整理新亞書院、美國非政府組織和英國殖民地政府三方面所持有的不同立場與觀點，並討論新亞書院如何在整個合併成為中文大學的過程中，與美國非政府組織和英國殖民地政府的假設、期望和要求互相磨合與影響。參與新亞書院的文化教育的三方面，各自都對中國文化和華人教育有不同看法和定義，並都想要把這些定義放到新亞書院的發展中，最後，這些互動緊扣的動機，反而倒過來使他們原來希望清晰地界定的中國文化身份認同，在香港變得越發虛浮多變和模糊不清；而他們三者合作和爭持的故事，述說了新